

# 传统质素和时代图景：也谈志书编修的承继与嬗变

——以浙江萧山修志为例

徐 鹏

**提 要：**对前代修志进行回望、总结与反思，是地方志编修的优良传统。二轮修志收官在即，本文以浙江萧山现存8部志书为例，由体例体裁、资料内容、性质功用三个维度切入，讨论方志编修如何在把握、擘画“地方”的传统质素与时代图景间因革演进，尝试触知修志文脉赓续的内在规律，以期对即将启动的三轮新志编修有所裨益。

**关键词：**萧山 传统质素 时代图景 三轮修志

地方志编修，素有回首前代以启未来的优良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两轮修志<sup>①</sup>，更将这一传统推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全国范围内围绕如何编就符合新时期特征的现代志书所作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从未停步。首轮各地普修通志，第二轮则多继之以续修，故二轮伊始，如何在继承首轮基础上发展出契合时代变化的体例内容，成为当时志界泚笔的焦点。<sup>②</sup>这也为此后二轮志书的编修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有鉴于此，结合地方修志传承对收官在即的第二轮修志进行回顾、反思，对系列修志成果作比对研究，其必要性自不待言。

## 一 问题的提出：变与不变的修志之思

仓修良在《二轮修志的继承与创新》一文中指出：“地方志这种著作，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其记载的内容也就不断地在扩充和发展，并且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在不断变化，因为它所记载的必须反映社会现实，因而所记的内容也必然经常在变，这就使得篇目设置也必须经常在变。所以修志同仁就有必要用变的观点来对待篇目设置，用变的眼光来看待方志编修，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sup>③</sup>笔者深以为然。于即将启动的第三轮修志而言，无论是通志还是续志，都必将继续面临“变”与“不变”问题的再讨论。

然在此之前，两轮修志的思辨，着眼点往往局限于前一代修志实践的总结回顾及当下自处之境的讨论思考。即使征诸历代旧志编修之抒议，亦多聚焦前志之失，以论新志之得。在这种隔代相望的横向比较研究范式下，其修志理论探讨必然也只能侧重于强调新志之变，即如何于前志之外自树立。不可否认，这种理论探讨，于新一轮修志的尝试和突破确有莫大的精神鼓励和技术支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毛泽东等主要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和倡导下，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开展过方志编修。然由于“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等原因而中断，持续时间不长，正式出版的志书也不多。因此，本文暂且不论。

② 如2003年9月，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辑的《新方志纠错百例》一书正式出版发行即为一例；又如2005—2015年，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公开出版5本《浙江方志研究论坛》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其中学者及修志者的反思文章颇具价值。

③ 仓修良：《二轮修志的继承与创新》，庞国凭：《二轮修志·浙江论坛》，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5页。

持。然其小样本、断代式的比较研究，必然导致勇于创新，而轻忽对于地方修志规律性问题的探讨，轻忽对于地方上长时段内修志传统赓续演进内在规律的把握。从纵向上观照，我国修志传统源远流长，一个地域数百年间屡修方志，其历代志人是如何在实践中不断地把握、擘画“地方”的传统质素与时代图景？其迭代之间是如何实现传统与革新之间的融合交进？这些问题的思考，不能不说，在此前的修志讨论中，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两轮修志的回顾争鸣中，声音尚嫌微弱，成果失之单薄。因此，对一个地方长时段内修志统绪演进作系统的回顾与梳理，探寻历代方志擘画“地方”传统质素与时代图景的内在规律，或可为筹谋三轮修志提供更深刻启示，树立更高标的。

本文选取浙江萧山修志为蓝本进行这一尝试。概以萧山现存6部旧志<sup>①</sup>、首轮《萧山县志》和二轮《萧山市志（1985—2001）》多为众口交赞的佳作。<sup>②</sup>特别是《萧山市志（1985—2001）》，2003年启动时即列为全国二轮修志试点，出版发行以来，来新夏、魏桥、王熹、巴兆祥、诸葛计等业内专家都曾撰文高度评价。<sup>③</sup>以其为个案进行研读、剖析、比对，无疑有着特殊的价值与意义。本文试从体例体裁、资料内容、性质功用三个维度切入，梳理萧山修志脉络，剖判其如何在绍述中赓续方志文脉的传统质素，如何在发展中擘画新的时代图景。笔者以为，即将启动的第三轮修志，唯有真正把握方志编修文脉演进过程中的“变”与“不变”，中国方志的在地性（Localization）方可于全球化（Globalnation）视野中得以更好地呈现。

## 二 体要新裁的共融

萧山修志，自明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凡十余修。民国《萧山县志稿》纂者杨士龙对明清修志情况概述道：“萧有邑志，宋元以来不详载籍。明永乐间，知县张崇奉敕重订志书。观其序言，前无专书。所谓旧志者，郡志而已。厥后，宣德、弘治、正德、嘉靖，凡数修辑，远者六十余年，近者仅十余年。明代修订，可谓綦勤。清踵明后，仅康乾间，一再修之。厥后，历嘉、道、咸、同、光、宣，百五十余年，竟阒然矣。”<sup>④</sup>民国前期，有民国《萧山县志稿》；后期，来裕恂以一己之力于1948年再成一志<sup>⑤</sup>，是为旧志之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部新志分别付梓于1987年和2013年。

现存的嘉靖、万历、康熙三志，均列纲目。嘉靖志设天文、地理、建置、食货、人物、列传、杂志，共计7个门类，乃知县林策于任上“访求得旧志并得田惟祐所藏私本，交由张焯、本地庠生钱穀据之增补订讹”<sup>⑥</sup>，可见嘉靖志是在正德及此前诸志基础上增订而成；而万历志与嘉靖志门目相同，只较嘉靖志增加了水利相关的《海塘图》《湘湖图》《长三闸图》《瓮三闸图》。则明代三志前后递相承袭的关系至为显明。然而代继之间，时事迁变，万历志在内容上仍

① 明代嘉靖志和万历志，清代康熙志和乾隆志，民国时期两部，分布均匀。

② 首轮《萧山县志》曾获浙江省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全国新编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

③ 来新夏、魏桥为《萧山市志》做序；王熹：《新修方志在学术上的两大突破——读〈萧山市志〉》，《光明日报》2015年7月28日，第10版；巴兆祥：《新方志的扛鼎力作：〈萧山市志〉读后》，《浙江方志》2016年第1期；诸葛计：《对新方志中“民俗”篇的一点议论——兼及2013年版〈萧山市志〉等》，《江苏地方志》2017年第5期。

④ 杨士龙：《再跋》，南开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整理：民国《萧山县志稿》（点校本），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页。

⑤ 以下，民国《萧山县志稿》简称《民国志》，来裕恂所纂《萧山县志稿》简称《来志》。

⑥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明清萧山县志》（点校本），上海远东出版社，2012年，第3页。

有自身的发展,“除补载自嘉靖至万历年间历史本身的变革之外,尚考镜前志未收之佚事,增录大量相关诗文”<sup>①</sup>。清康熙《萧山县志》之修,“重行纂辑,采集考订”,衍为21卷18门,较明志多出山川、古迹、物产、风俗、灾祥、田赋、水利、学校、祠祀、武备、职官等11门,类目愈趋详明,记述更为赅备,体例门类上即可见其新变。至乾隆《萧山县志》,设平目体,置29门,较康熙志又多11门。然对康、乾二志详加推敲,自体例到记述内容,前后因袭的痕迹清晰可见,11门的增设,无非是将前志部分门类进一步细分。故详考明清萧山修志前后义例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出志书的体例体裁因顺明清社会发展,其记述对象不断细化,记述内容不断扩充,踵事增华之意愈趋明显。

至民国,两部县志稿虽体例上承袭旧志的痕迹宛然可见<sup>②</sup>,但具体篇目设置和体裁运用上已可窥及近代社会记述之诉求。《民国志》33卷,约90万字,列《志例举凡》17则,“论康、乾旧志得失,评述本志分门理由,均称详尽,更著新意”<sup>③</sup>。如《诗文》留意抄撮政教、社情篇什;入志地图开始采用近代科学绘图法,“旧志……非惟无用,舛漏实多。今以不能一一急事测量,仅依新法测定,为图凡六……均为方志必不可少之图,他日从事测绘分图,均当补列入之”<sup>④</sup>。来新夏评价其“固非一般地方志书之陈规可比,适以见民初修志之要略”<sup>⑤</sup>。尤其是第二部《来志》,共15卷,约80万字,“采取年鉴方式,改良旧例,参酌各地方志,准以内政部所颁示,分别纂之”<sup>⑥</sup>,始设经纬度数、地质、土壤、气候、潮汐、山川变态、路线运输、邮电、经济、农业、行政组织、民意机关、人民团体、财政、警察、卫生、司法、新闻事业等近代学科、行业门类,志首设大事记,于民生事业相关内容置大量对比表和统计表,较前志迥然,新方志体例雏形初现。

新中国成立后萧山的两部新修志书更打破旧志藩篱,门类设置与历代旧志大异其趣。首轮《萧山县志》设23编,置人物、附录,全志“非续非补,实为创编,上承旧志精华,于篇目取材多所创新”<sup>⑦</sup>。如将增加全县土地面积四分之一的“围垦”升格为编;于社会编中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特殊居民——“堕民”升格为章,等等。上述调整,在当时多数县志参照指定篇目执行的大环境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第二轮《萧山市志》为续志,设45编,共6册<sup>⑧</sup>,自出版以来,以其大量社会调查入志等创新实践,以及重普通萧山人物记述,而引起广泛关注。<sup>⑨</sup>然细加推究,其于前志体例技法的继承处处可见,如被广为赞誉的新体裁——“边注”的使用,其实

①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明清萧山县志》(点校本),第151页。

② 首部民国《萧山县志稿》在《志例举凡》直言,“兹编仍踵康熙志例”,即纲目体。来新夏教授在《来志》的点校整理《说明》中亦写道:“《萧山县志稿》乃先祖在民国二十四年刊本《萧山县志稿》基础上删繁补略,斟酌体例重加编纂而成。”

③ 来新夏:《〈萧山县志稿〉整理前言》,南开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整理:民国《萧山县志稿》(点校本),第2页。

④ 杨士龙:《志例举凡》,南开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整理:民国《萧山县志稿》(点校本),第20页。

⑤ 来新夏:《〈萧山县志稿〉整理前言》,南开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整理:民国《萧山县志稿》(点校本),第2页。

⑥ 来裕恂:民国《萧山县志稿·凡例》,来裕恂纂,来新夏点校:民国《萧山县志稿》(点校本),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页。

⑦ 来新夏:《萧山县志·序》,萧山县志编纂委员会:《萧山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页。

⑧ 包括《索引》《口述历史》《社会课题调查》三部专立分册。

⑨ 参见巴兆祥:《新方志的扛鼎力作:〈萧山市志〉读后》,《浙江方志》2016年第1期。

在乾隆志和民国两志中已有“条注”“附注”，功能上亦颇相类，注考异、出处等；专设《索引》一册是为弥补首轮县志仅列《表格索引》之不足；升格编“垦区开发”由首轮县志“围垦”而来；《〈萧山县志〉（1987年版）勘误》也可视为《萧山县志稿刊误》《〈萧山县志稿〉勘误表》的绪余。由此可见，两部新志虽被视为“体制上不墨守成规而随着时代前进，新建若干篇目，用以反映现实”<sup>①</sup>，但也必须看到其“遍征旧作”的传统依凭。<sup>②</sup>尤有可说的是，两部新志的顾问来新夏，就是乃祖来裕恂民国《萧山县志稿》的点校者。家学绍继，这又是方志文脉接续于人事上面的明征。

总之，近代以来，社会形态的革新、时代内容的嬗变，对志书的编纂记述发生了决定性作用，4部志书从体例到内容，逐步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变，最终确立了新时代的方志图景。然自其不变者观之，仔细推求萧山现存8部志书前后发展轨迹，又可看到，所有的创新无不基于对方志传统质素的深刻理解与继承。

### 三 事贵核实的执守

纵观萧山现存8部志书的相承与演变，除却体例、体裁外，另一显见的传承即是一代代萧山志人对资料内容所秉持的“事贵核实”之理念。

以续修为例，为嘉靖志做序的黄九皋在谈及增续要义时言：“续焉不能不详，其详不敢不核，由是政有所资，俗有所考，后来继起有所承循”<sup>③</sup>。后继万历志，虽言重修，实亦补续。罗万化在序中赞曰：“其词核，其义正，酌古而准今，纲举而目张，详哉其言之矣。”<sup>④</sup>可见明人续修之审慎、增补之精详。至于康熙志，虽称疏漏，但其最后增辑本志序中，知县刘俨对志书滥收忠孝贤节人物的做法也还是提出了“后之从事于斯者，与为邀誉，毋宁核实；与为负谤，毋宁谨严”<sup>⑤</sup>的忠告。而乾隆志在毛奇龄“以萧山新修县志踏驳失考，因逐各条为之厘正”<sup>⑥</sup>作《萧山县志刊误》的前提下，仍持重审慎。知县黄钰在乾隆志中“条注亦有订正前人之失者”，如《山川》门“同浦”条下注云：“按《县志刊误》改‘同浦’为‘回浦’……毛西河硬指萧山海门蕞尔之地为宋时回浦，已与《宋书·地志》刺谬；且作《三诘三误辨》，谓《汉书》回浦非县名，且两都尉治隔江对峙，逞其私议，紊乱地志，此误之又误者”<sup>⑦</sup>。乾隆志在乾嘉考据学风的裹挟下，较前志更为注重地理沿革与旧有文献的考证。

《民国志》“固非一般地方志书之陈规可比，适以见民初修志之要略”，然对资料上的不足却有着与毛奇龄、黄钰一脉相承的体认。“旧志沿误甚多，毛西河县志刊误，博征雄辩，自成一

① 来新夏：《萧山市志·序三》，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萧山市志》第1册，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

② 如首轮修志过程中，萧山县志办在浙江图书馆发现了来裕恂编纂的民国《萧山县志稿》未刊稿，系孤本；首轮结束及第二轮编修过程中，萧山县志办又将现存的6部旧书点校整理出版。

③ 黄九皋：嘉靖《续修萧山县志·序》，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明清萧山县志》（点校本），第8页。按，嘉靖志曾两修，此为嘉靖三十六年（1557）增修之序。

④ 罗万化：万历《重修萧山县志·序》，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明清萧山县志》（点校本），第155页。

⑤ 刘俨：康熙《重修萧山县志·序》，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明清萧山县志》（点校本），第345页。

⑥ 《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648页。

⑦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明清萧山县志》（点校本），第657页。

家，然亦有近于武断者。兹编加以考证，间于毛氏之说，有所订正。其毛氏所未及者，亦引他书以参证之。”<sup>①</sup>全志以大字列纲，小字附注史料依据，且于卷末附《〈萧山县志稿〉勘误表》。内容上，纂者杨士龙已注意到“共和以来，与民更始，百废皆新，廿余年间，可纂录之事实已丛积，正革故鼎新之良会。如铁道也，公路也，农产工业之盛衰也，货币物价今昔之同异也，土货外货消费之比较也，皆与民生有至大之关系，为方志所不可略者”<sup>②</sup>，遗憾的是，《民国志》纂修数易其人<sup>③</sup>，因而付梓时仍袭旧志未予新增，唯期待“今后之明哲君子，厘正义例，重订门类，以续纂之矣”<sup>④</sup>。所幸来裕恂承前人之志，“凡切于民生日用，如农业、林业、矿业、盐业、渔业、工业、商业，其计划、设备、产销等，尤其注重”。不仅如此，为了“俾读者得检原书及近事来历”，《来志》在《凡例》中对资料出处详加说明，如对历代旧志标识简称，“他书及调查所得，而为今所辑者，下注新纂”，“但于原文出处，仍在每条之末，详注见某书”，等等。受民主、平等思想影响，全志“凡从前体制，如避讳抬头，一概删削”<sup>⑤</sup>。不难看出，萧山历代旧志的编修传统中，后继者对前志都有较为理性而客观的评判，尤其是在史实考订、资料出处方面，师古而不泥古。

迨至两部新志，时移世易，于体例内容、语言文风无不发生前所未有之变，然于资料考订亦踵武前贤，更有创新。首轮《萧山县志》定稿后，广邀各方人士进行审议，“自理论至实际，自大要至细节，反复商讨推敲，各贡所见，力求确当”<sup>⑥</sup>。同时于附录中首述历代修志之始末，并列自宋代至民国萧山一域的各类专志、杂志存目等珍贵史料目录。二轮《萧山市志》针对首轮县志生物部分未加注拉丁文二名法、部分史实与行文讹误等不足，在新修市志中予以补缺纠谬。同时对一些珍贵、存疑或需要解释的资料，以“边注”记之，且载且考，审而慎之。更值得一提的是，《萧山市志》还专设《社科课题调查》与《口述历史》两册，“就市志攸关民众吃、穿、住、行、教育以及‘以事系人’‘以人系事’等缺乏鲜活资料的实际状况，展开系统调查和口述访谈，并从调查样本和口述资料中整理出相关内容，以弥补市志所缺的最新资料，充实了官方文献所缺的社会輿情资料，较为圆满地解决了社会内容资料短缺的问题”<sup>⑦</sup>。

以上，明清至民国、当代，历代萧山志书在资料考订整理的方式方法上，呈现出明显不同的气象。明清重在传统考订辨误，近代以还则重在文献质征，跨代之际，时代精神的不同诉求在志书资料撰述间展露无遗。然于另一角度来看，萧山修志一以贯之的“事贵核实”的价值观，又通过沉淀于传统之中、彰显于志人之身，实现了它的代际传承。

#### 四 修志为用的阐扬

作为“官书”，地方志素有“存史、资政、教化”诸功能。从现存志书来看，萧山历代修志

① 杨士龙：《志例举凡》，南开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整理：民国《萧山县志稿》（点校本），第22页。

② 杨士龙：《〈萧山县志〉跋》，南开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整理：民国《萧山县志稿》（点校本），第520页。

③ 首部民国《萧山县志稿》纂修历时23年，县知事和县长更迭16任，总纂三易其人。

④ 杨士龙：《再跋》，南开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整理：民国《萧山县志稿》（点校本），第18页。

⑤ 来裕恂：《萧山县志稿·凡例》，来裕恂纂，来新夏点校：民国《萧山县志稿》（点校本），第1页。

⑥ 来新夏：《萧山县志·序》，萧山县志编纂委员会：《萧山县志》，第7页。

⑦ 王熹：《新修方志在学术上的两大突破——读〈萧山市志〉》，《光明日报》2015年7月28日，第10版。

者对志书的性质、作用等均有相对明确的认识和阐扬。

萧山于有明一代，永乐、宣德、弘治、正德、嘉靖、万历、天启朝7次编修县志，平均不到30年即有一次，浙江乃至全国几无出其右者。如此频繁的修纂，不仅由于萧邑山川明丽、民物茂繁，更因俊才辈出、留意志业。<sup>①</sup>如弘治十四年（1501）的解元田惟祐曾为弘治志做序，致仕家居后，又订正正德志。尽管二志已佚，然从现存志序中仍可见明代对方志性质、作用持有鲜明的观点，“志非史，有史之法也，非具三长，安可以与此？况一邑之公书非一人之私见所能就。而或考究不精，去取不当，则不足以昭公论，传实录，而垂信于后矣”<sup>②</sup>。田氏认为，志为一邑之公书，虽不同等于史，但亦要循史法，编修者须备史才、史学、史识，才能得史之遗意，观兴衰，备遗忘，存劝诫。能敏锐地意识到史志之殊，于明代颇为不易。

尽管清代萧山仅成两部县志，然受时代政治与学风之影响，无论修志理论或实践都和其脉搏、着其烙印。如乾嘉时期，修志考据派和文献派曾有论战，前者在当时是为主流，及至清末民国，则又以章学诚为代表的文献派成为显学。这一流变在萧山修志上体现得尤为明显。首纂康熙志的知县邹勳认为：“县之有志，犹国之有史也。一代之政，非史不传；一邑之事，非志不显。然非独存为典，故实政治得失之林也。”<sup>③</sup>毫无疑问，康熙志承袭了明代方志属史，以“备忘纪远，彰往察来”的传统。至乾隆志，乾嘉学风正炽，主修黄钰尚考据派，主张方志属地理书，强调资料内容的“准”与“信”，不过其亦申明，重修县志的目的在于援古证今，以正前志之“烦猥错迕”，“备他日信史之采”，因此对方志功用的认识与前人并无二致。

民国时期，由于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对章学诚修志理论的推崇，使得民国志书颇承章实斋而有所变通者。<sup>④</sup>《民国志》载：“方志为郡邑分类纪实之史，与国史同源而异流。故有一时代之事实，即有一时代之方志，窠臼相承，不以为异”，“方志为地方利弊得失之明镜，有征斯可信，匪细事也”<sup>⑤</sup>。至《来志》，由于纂者有旧学根基，又以东渡日本而有新学气象，因此既赞章氏“富有史才”，同时亦指出其所纂之志“援国史体而为邑志，似嫌繁缛”。因而在《凡例》中援引李泰棻、黎锦熙、余绍宋等民国方志学者的观点，认为“方志者，乃记载研究一方人类进化之定义”，“今修方志，不分史地，勿泥体裁，时代需要，须呈四角。所谓四角者，科学资源、地方年鉴、教育材料、旅行指南。盖注重于科学之整理，不拘成式”<sup>⑥</sup>。对方志的定义、性质、功用等的阐扬都更切近于时代发展与社会变迁之需要。

新中国的两轮修志，经过多次讨论，国家层面出台条例，对地方志的定义、性质予以规范，即为一种“资料性文献”。至于作用，虽然未予规定，实则延续了旧志“存史、资政、教化”之传统，而改“教化”为“育人”。萧山的两部新志恰是基于其作用之上的开发利用迎合了时代发展与普通民众阅读习惯的改变而有所创新。以第二轮《萧山市志》为例，市志出版后，萧山的

① 仓修良在《方志学通论》中分析明代方志编修特点时指出，明代修志，著名学者参与其事不多，在政府三令五申之下，地方官不得已雇佣一些乡曲之士从事编纂，因此传世佳志较少。

② 田惟祐：明弘治《萧山县志·序》，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萧山市志》第3册，第2728页。

③ 邹勳：《萧山县志·序》，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萧山市志》第3册，第2730页。

④ 参见杨士龙：《〈萧山县志稿〉跋》，南开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整理：民国《萧山县志稿》（点校本），第17页。

⑤ 杨士龙：《再跋》，南开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整理：民国《萧山县志稿》（点校本），第18页。

⑥ 来裕恂：民国《萧山县志·凡例》，来裕恂纂，来新夏点校：民国《萧山县志稿》（点校本），第1页。

修志人仍在不断探寻如何让更多读者随时随地可读志用志的便捷之路。2019年年初,“掌上史志”在区史志办官方微信公众号“萧山史志”正式上线,包括了《萧山市志》在内的8部志书,“这也意味着读者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通过电脑或手机检索到历代萧山志书中的人、事、物,进行跨文本、全文本阅读、检索和使用”<sup>①</sup>。与此同时,萧山区史志办还与浙江大学签订关于建设数字版《萧山县志》的科研合作项目,旨在通过现代数据库建设的先进技术将历代遗存的纸质《萧山县志》呈现在浙江大学的“学术地图发布平台”上。“大数据+学术地图创新团队”通过对已经完成点校整理的5种萧山旧志电子文献进行结构数据提取,将人物、列传、官师、选举、流寓、烈女、名宦、忠孝、邦贤等数据转成带有经纬度的地理信息数据,上传到“学术地图发布平台”,从而形成数字人文版《萧山县志》地图,用于学术研究、旅游开发等更为广阔的领域。通过上述一系列举措,历代萧山修志者对方志利用价值最大化的夙愿得以实现,而地方志这一古代精英文化的产物,也越来越从庙堂走向大众。

可以说,历明、清、民国而至新中国,萧山修志对方志定位、性质和功用的思考与探索从未止步。虽以不同时代的政治、学术的话语导向,而致各个时段修志定位和功用导向有所不同,但修志为用、修志为民则是其间若隐若现、延绵不断的精神质素。

## 结 语

前文以萧山现存8部志书为纵轴,对有明以来志书编修的承继与嬗变作一全景式观照,旨在通过“解剖麻雀”,触知、蠡测明清、民国以及当代志人如何在不同的时代学风中绍继前哲、推陈出新,去把握、擘画一个个“地方”的传统质素与时代图景。两轮修志以来,举凡佳志面世,往往各家书评共贺,人们不吝溢美之辞,赞其独得之秘、开山之功,于这一现象,实有必要作更加审慎的思考与甄别。在对萧山历代修志的梳理中不难发现,作为一个时代的记述文本,方志编修之成败,无疑在于能否深刻把握、迎合时代之风会。如《来志》之所以得后世推重,即在于其于近代性之彰显;《萧山市志》所以能在众多第二轮志书中脱颖而出,也是由于它所阐扬的“在地性”和向下视角。然志书编修之所以能够创新,却是以其与前代修志的接续,以沉淀于方志文脉中的传统质素于其间所发挥的作用。即如上文所述,历代志书中的新创,总不难在方志文统中觅其踪影、察其精神。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绍述层累而就、隐现于历代志书之间的方志文统,是后来修志者所以能够实现真正创新的基石。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今天,思考第三轮修志的启创,就必须强调方志文脉的千载赓续之重,这应该成为讨论第三轮修志创新发展的认知前提。

然而如何在“照顾到方志有别于其他著作的固有特点和体例”<sup>②</sup>的基础上常编常新、绵延发展下去,把握、擘画新志与时常新的时代图景,亦是三轮修志所面临的一大难题。从萧山历代修志赓续中可以见出,一代修志的创新,除必须基于对方志传统之深刻理解和承继外,亦应讨论第三轮修志所在时代之于方志文本的诉求。这一宏大命题,关联学科众多,所涉人事颇繁,非笔者一人之力所能尽言,亦非本文主旨所在。此仅自上文论述的启迪出发,赘谈两点浅见。

(一) 数字修志。此前修志因资料博杂,众手成书,导致编出来的志稿参差不齐的情况较为普遍。对此,前人已有很多讨论和努力,值得借鉴。然接下来的第三轮若能定位为数字修志,如

<sup>①</sup>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网:《“掌上萧山志”正式发布 全国首家》[http://www.xiaoshan.gov.cn/art/2019/1/14/art\\_1302906\\_29417867.htm](http://www.xiaoshan.gov.cn/art/2019/1/14/art_1302906_29417867.htm)。

<sup>②</sup> 参见仓修良:《二轮修志的继承与创新》,《二轮修志·浙江论坛》,第62页。

通过 AI 获取特定来源的资料，经语义分析、情感分析、文本摘要等技术进行优化处理，用固定算法将其重新排列组合，再以特定格式予以呈现<sup>①</sup>，则困扰志书编纂已久的诸如要素不全、文风不一等问题或可迎刃而解。同时，各类数据库带来的海量资料，或也可解决以往修志资料短缺、查找困难等问题。数字修志时代，专家设计体例框架、篇章结构并导入计算机，粗具规模的资料长编在理论上已经具备按下 ENTER 一键生成的可能性。基于此，第三轮修志中，打造、引进各类基础资料数据库，实现修志数据的云共享和持续更新，以及与地方大数据局（中心）的合作显得尤为重要。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实现传统线下编修向线上“云”修志的转变。

同时，此前两轮修志，受制于诸多因素，志书的开发利用一直是薄弱环节。近年来，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部分地方志机构借此东风，将文化遗存进行音视频、数字网络等多种形式的展现，以符合越来越个体化的使用需求。2020 年 11 月中旬召开的第二届地方志与长三角一体化论坛上，以“长三角一体化和方志数字化发展”为主题的讨论集中展示了三省一市地方志机构响应《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共同打造数字长三角”的举措和成果，各地在如何利用新技术进行读志用志方面做了很多有益尝试，如建构图、文、声并茂的方志数据库，开发可检索图像、录音资料的专业软件，打造百万访问量的微信公众号，等等，以上都是用志形式多元化的最好注脚，也为三轮修志提供了更多启迪。

（二）学科跨界。一直以来，地方志都是理所当然的文史旗下之学，修志人员的专业背景多系人文社科类，虽然也有一些理工科方面的专业人才参与其中，但毕竟不是主流。据笔者所见，不少地方的修志工作者，仍然抱有修志本文人之事、史家当行的传统观念。马克斯·韦伯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说：“激动我们的问题并不是未来的人将怎样的丰衣足食，而是他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sup>②</sup> 同样，未来志书的编修更应关注的是“人”，“什么样的人”指的就是具有什么样思维方式的人。

在当下以及可以预见的不久将来，跨界融合已经并将深度普及至各行各业，信息整合、融媒体等的应用也已打破传统文科的界限。作为横陈百科、记述当代社会的地方志书，不论是记述对象、还是修志业务本身，如果不能主动拥抱这一变化，即有自外于社会发展潮流的危险。第三轮修志转型，首先就应当转变传统的文科修志思维，要变单一的人文社科思维为复合的交叉学科思维，广泛甄选和培养具备理工科思维方式的人才进入修志队伍，运用文理复合的思维方式，去推动修志工作与跨界融合的数字时代无缝对接。惟其如此，方可以在未来的“融媒体”“融文化”时代占得一席之地。

（作者单位：浙江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本文责编：周全

<sup>①</sup> 参见赵海良：《人工智能在方志编纂中运用初探——以百度人工智能在〈浙江通志·大事记〉编纂中的应用为例》，《中国地方志》2020年第4期。

<sup>②</sup> 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90页。